

# 论毛泽东两篇历史性文献的内在关系

## ——兼论毛泽东为何不同意公开发表《论十大关系》

张传武

(中共山东省委党校机关纪委,山东 济南 250103)

**摘要** 《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第一个系统性理论成果,提出了若干富有价值的理论观点和重要原则,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第二次飞跃的重要起点,具有无可置疑的理论价值和历史地位。《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总题目,运用矛盾分析法,对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索,特别是将之上升为“一门科学”,为系统研究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中的重大关系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和开放性体系,创建了进行理论分析的基本架构,层次高,视野宽,是对《论十大关系》的创新、升华和超越。《论十大关系》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和阶段性成果,后者吸纳了前者的精华和已经成熟的思想观点。毛泽东生前之所以不同意公开发表《论十大关系》,其主要原因在于他认为这篇文献不是成熟之作,其中的若干重大关系问题需要实践提供更多的经验,作出进一步探索研究。

**关键词** 十大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创新;升华;超越

(中图分类号) A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3909(2016)06-0027-07

DOI:10.14110/j.cnki.cn-37-1059/d.2016.06.006

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下简称《正处》),是在中央内部会议讲话基础上整理形成的两篇历史性文献,产生了重大影响,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这两篇重要文献有着何种内在关系?毛泽东为什么大张旗鼓宣传《正处》,而始终不同意公开发表《论十大关系》?本文试作初步探讨。

### 一、《论十大关系》的历史定位

《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探索适合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起点和首个系统化理论成果,从指导思想到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方面,都提出了全新的理念思路和方法,是开始摆脱苏联模式、走自己的道路的标志。毛泽东后来多次提到这篇文献,从中可以看到它的重要意义和历史地位。

1958年3月,毛泽东回顾了独立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程,指出“一九五六年四月的《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十大关系中,工业和农业,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国家、集体和个人,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这五条是主要的。一九五七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讲了工农业同时并举、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农业合作化等问题。”<sup>①</sup>

1960年6月,毛泽东写出《十年总结》,着重总结1956年以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指出:

[作者简介]张传武,男,哲学硕士,中共山东省委党校机关纪委书记,全国毛泽东思想生平研究会理事。

①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11页。

“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开始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sup>①</sup>。

党的八大以《论十大关系》为“纲”,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关于这一点,刘少奇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明确指出,党的八大政治报告“就是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处理十大关系的方针政策而提出的”,“由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上述方针和各种政策,在实际工作中起了巨大的作用”<sup>②</sup>。

毛泽东生前没有再对《论十大关系》进行整理加工修订。中央曾分别于1965年12月和1975年7月提供了两个整理稿,但毛泽东均不同意公开发表,只同意发党内讨论征求意见。直到他逝世后的1976年12月才首次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产生了广泛深刻的重大影响,成为改革开放后我们党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思想来源。

《论十大关系》创造了从分析重大关系入手,研究揭示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探索开辟适合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科学方法,提出了许多至今仍需深入探索的课题,特别是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依据本国国情走自己的道路的根本观点,是一篇影响深远的历史性文献。

## 二、《正处》是对《论十大关系》的创新、升华和超越

1955、1956、1957年是毛泽东思想上的活跃期和收获季,思想观点快速发展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特征。这时的毛泽东思维异常活跃,在思想的海洋里纵横驰骋,显示出非凡的创造活力。他以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第二次飞跃为目标任务,集中精力总结“一五”经验和反思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连续不断地探索提出卓越思想,当然也时有反复。从探索和形成《论十大关系》的过程看,经历了由不系统到比较系统的过程:先是1956年4月归纳出四大关系,旋即概括为六大关系,4月2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十大关系,5月2日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出进一步阐述。

《论十大关系》讲话发表之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不断深化,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观点,如“双百方针”、“两个万岁”、“新经济政策”等。他认识到社会主义建设涉及到许多重大关系,社会主义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需要对实践中遇到的一系列重大关系作出系统深入科学的探索研究。经过党的八大,其他领导人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如陈云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董必武的扩大人民民主与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思想,加上苏联暴露出来的问题特别是1956年下半年的波匈事件的教训和警示,于是,毛泽东高度关注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人民内部的关系问题。在1956年12月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提出了关于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正确处理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论断。1957年2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正处》。实际上毛泽东在确立辩证分析探索重大关系的方法后,又找到了探索研究的总抓手,这就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他将之称为“总题目”,提升了高度,明确了主题,不再受十大关系的限制,而是从实际需要出发,根据实践中遇到的问题,不断提出并深入研究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关系问题。《正处》提供了一个开放性体系,创建了一个理论分析的基本架构,实现了对《论十大关系》的突破、升华和飞跃。

从指导思想上看,两篇文献完全一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开宗明义:“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sup>③</sup>在讲话结束时再次强调,这十种关系都是矛盾,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

①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18~419页。

②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300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页。

义国家<sup>①</sup>。在《正处》中指出: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线,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目的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sup>②</sup>。毛泽东指出,十大关系就是十大矛盾,分析关系就是分析矛盾,这与《正处》的提法完全一致;不同之处在于,《正处》不再用十大关系来概括,而是改用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总题目”,不管有多少重大关系需要探索研究,都可以纳入这个总题目,从而层次更高,视野更宽,理论概括力更强。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最后正确地预见到,“在处理这些矛盾的过程中,一定还会遇到新的矛盾,新的问题”<sup>③</sup>。就是说,事关社会主义建设大局的不限于已经提出的十大关系、十种矛盾,即使是这十种矛盾,其本身也是发展变化的,需要不断深化认识。由此观之,《正处》把《论十大关系》中所体现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各种关系的思想,升华到了一个新的理论高度。

从内容上看,《正处》与《论十大关系》既一脉相承又有重要发展。1956年3月,毛泽东在主持讨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时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有矛盾就有斗争,只不过斗争的性质和形式不同于阶级社会罢了。《论十大关系》提出十大关系就是十大矛盾,其中“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与“是非关系”,是直接论述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等,也都是人民内部矛盾的具体内容。《正处》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认识又前进了一步,使之更加深入和具体化。通过比对可以看出,《正处》中的“肃反问题”即是《论十大关系》中的“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正处》中的“少数民族问题”即是《论十大关系》中的“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正处》中的“统筹兼顾、全面安排”即是《论十大关系》中的“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正处》中的“中国工业化道路”即是《论十大关系》中的“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正处》提出一个重要理论观点,就是把经济建设中的矛盾一并归入人民内部矛盾的范畴。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我们主观认识之间存在矛盾,“这个矛盾也将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即比较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的一些人同比较不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的一些人之间的矛盾,因此也是人民内部的矛盾”<sup>④</sup>。《正处》最后两段话讲到了中国和外国关系,与《论十大关系》中的“中国和外国关系”相对应,《正处》中的“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与《论十大关系》中的“党与非党的关系”对应,《正处》中的“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应于《论十大关系》中的“是非关系”。关于《正处》对于《论十大关系》的创新发展以及以后的深入探索发展,毛泽东在1958年3月曾指出:“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是在一九五七年二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才更明确地提出来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是在过去八年中逐步形成起来的”<sup>⑤</sup>。

从探索的方法和重点上分析,关于适合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经历了一个由参照外国到以我为主的转变。探索伊始是“以苏为鉴”,采取对照研究的方法,后来随着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进行,逐步转为以深入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为主。1958年5月,毛泽东指出:“我为什么讲十大关系?十大关系的基本观点就是同苏联比较,除了苏联的办法以外,是否还可以找到别的办法,能比苏联、东欧各国搞得更快更好。”<sup>⑥</sup>同年6月,毛泽东进一步明确提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sup>⑦</sup>以此为重要标志,我们党进入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新阶段。

①②③④ 《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4、216、44、242页。

⑤⑥⑦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12~313、353、370页。

### 三、毛泽东为什么不同意公开发表《论十大关系》

#### (一) 分析几种说法

##### 1. “不是我的创造”

有的学者提出毛泽东认为“不是我的创造”这是毛泽东不同意公开发表的主要原因之一。党的八大期间,毛泽东在接见南斯拉夫代表团的谈话中说“你们提到的《论十大关系》,这是我和三十四个部长进行一个半月座谈的结果。我个人能提出什么意见呢?我只是总结了别人的意见,不是我的创造。”<sup>①</sup>有论者据此认为,“不是我的创造”多少道出了他对这篇文章的一个基本态度。其实,这是毛泽东常用的说法。他在评价《毛泽东选集》时鲜明指出“《毛选》,什么是我的?这是血的著作。《毛选》里的这些东西,是群众教给我们的,是付出了流血牺牲的代价的”<sup>②</sup>;“我写的文章就是反映这几十年斗争的过程,是人民革命斗争的产物,不是凭自己的脑子空想出来的。先要有人民的革命斗争,然后反映在我们这些人的脑子里。既然有人民革命斗争,就产生要采取什么政策、策略、理论、战略战术的问题,栽了跟头,遭到失败,受过压迫,这才懂得并能够写出些东西来”<sup>③</sup>;“《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就是记录三年解放战争的事”<sup>④</sup>;“是那个时期的一些政策的记录,包括政治、军事、经济、党和群众工作这些方面”<sup>⑤</sup>;“我只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到中国革命实践中去。我没有什么著作,只是些历史事实的记录”<sup>⑥</sup>;“都是人民群众的经验,我作的总结”<sup>⑦</sup>。由此可见,毛泽东这次关于“不是我的创造”的说法没有特别意义。毛泽东的优势和特点在于善于汲取一切积极的思想成果和成功的实践经验,勇于创新,善于对一些概念和命题作出“新解”和“深解”,赋予具有时代特征的崭新内容,比如对于“实事求是”的“改造加工制作”便是最典型的例证。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

有人提出,《论十大关系》是受到刘少奇的启发,听取30多个部门的汇报后形成的,不同意公开发表是为了不“掠人之美”。这个理由也不能成立。其实,关于“人民内部的矛盾”的概念也是刘少奇较早提出的。早在1951年五六月间,刘少奇在一篇读书笔记中提出“一切事物的构成都是矛盾的构成,国营工厂的内部结构当然也是矛盾的结构。什么是构成国营工厂的内部基本矛盾呢?这就是国营工厂管理机关与工人群众之间的矛盾,就是国营工厂内部的公私矛盾。这种矛盾与资本家工厂的阶级对抗完全不同,它是一种在根本上非敌对的、可以和解也应该调和的矛盾。但它是一种不容否认的、客观存在的、真正的矛盾,是在长时期内要我们来认真地加以调整和处理的矛盾。”他还指出“矛盾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在根本上敌对的不能和解的矛盾;另一类是在根本上非敌对的可以和解的矛盾。”<sup>⑧</sup>而且,1957年,刘少奇几乎与毛泽东同时又提出一些重要观点。但是,完整提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不是别人而是毛泽东,毛泽东并没有因为是刘少奇等率先提出这一概念并作初步研究而不再涉足。

##### 2. “以阶级斗争为纲”取代经济建设

有论者认为,1965年12月,刘少奇提议公开发表《论十大关系》时,毛泽东正在酝酿发动“文化大革命”;1975年7月,邓小平再次提议公开发表《论十大关系》时,正值毛泽东反击右倾翻案风、维护“文化大革命”,其注意力转移到阶级斗争,不再重视经济建设。仔细分析,这也是似是而非的。这种观点与一种流行的“解读”有关。不少人认为《论十大关系》是探索经济之作,《正处》则是研究政治之作,事实不是这样,而是《论十大关系》中有政治,《正处》中有经济。《论十大关系》并不限于探讨经济工作,虽然毛泽东后来说过“十大关系中前五条是主要的”,但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的内容却占了一半以上的篇

① 《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8页。

②③④⑤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29、161、173、241页。

⑥⑦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81、483页。

⑧ 《刘少奇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3、94页。



幅。毛泽东不仅从经济方面探索调动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还注重从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调动各种积极因素。即使在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之后,毛泽东仍然要求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一起抓,“文化大革命”中提出“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直到晚年,毛泽东也没有否定经济建设,他支持四届全国人大重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不仅提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要求,而且支持为此而进行的整顿措施和作出的种种努力,只是强调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特别是不能容忍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关于毛泽东是否重视发展生产力的问题,邓小平正确地指出,毛泽东“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是说他不想发展生产力,但方法不都是对头的”<sup>①</sup>。况且1975年7月还没有提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问题。所以,上述说法缺乏理论根据和事实依据。

## (二) 原因探析

### 1. 关键是透过现象看本质,抓住实质性问题,从内容和思想发展脉络角度分析

《正处》的许多内容是对《论十大关系》的直接延续和深化发展,分析更具体更深入更系统,理论层次更高。只要通读两篇文献并对照分析,就会发现二者之间的内在关系,即创新、升华和超越关系。

之所以说《正处》与《论十大关系》是创新、升华和超越关系,而不是姊妹篇,主要理由是:经过集中探索和思考,毛泽东的思想认识升华,产生飞跃,《正处》使用了“总题目”的新提法,以人民内部矛盾总揽全局,“十大关系”以及其他事关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关系问题都被纳入这个“总题目”,并且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上升为“一门科学”。《正处》对《论十大关系》中的“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中国和外国关系”等政治类关系,在相关部分作了论述,增加了一些新观点;用“工业化道路”集中概括经济领域中的重大关系,并且对于为什么把经济关系纳入人民内部矛盾的范畴作了说明。毛泽东在讲话前亲笔写下《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详细提纲,其中两处提到“十大关系”,一是在回顾两类矛盾思想的形成过程的最后,提及《论十大关系》;二是在最后写入“十大关系”。显而易见,二者具有密切的内在关系。《正处》开宗明义:“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是一个总题目。为了叙述的方便,分为十二个小题目”<sup>②</sup>。现在一般都不提及讲话提纲最后列入的“十大关系”,这不利于准确理解毛泽东的原意。再则,在《正处》原稿中,毛泽东明确指出“工业化的道路,我们现在走的是不是完全跟苏联相同?我想有些不同。在《论十大关系》里头,有几条关系都讲到这个问题。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的投资比例,应该比较过去有一点改变。”<sup>③</sup>这段话涉及《正处》与《论十大关系》的关系定位,由此也可以看出两篇文献之间的关系。总之,从毛泽东关于总题目的观点和其思想脉络考察可以看到,“十大关系”是总题目中的具体内容,《论十大关系》是酝酿创立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重要阶段性成果。正如毛泽东本人所说“我在最高国务会议讲话所谈的问题,本来在心里积累了很久。”<sup>④</sup>这样一来,就可以比较容易地理解毛泽东为什么花费巨大精力,先后对《正处》修改13稿,并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而对《论十大关系》却始终保持低调,不同意公开发表的原因。

### 2. 不同意公开发表的原因主要是《论十大关系》本身不够成熟

毛泽东晚年对一些重大关系始终在探索中,如国家的经济建设布局问题、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等,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一直在进行实践探索和理论思考,试图修改完善,所以毛泽东不认为《论十大关系》是成熟之作,其地位不能与《正处》等量齐观、相提并论。

《论十大关系》不够成熟,其突出表现是关于经济方面的重大关系问题,毛泽东一直在继续探索。有了“大跃进”的经验教训,有了十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特别是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国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4页。

③ 《毛泽东思想形成与发展大事记》,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69页。《毛泽东传》(1949—1976)(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628页。

④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00页。

家安全面临危险的严峻形势下,毛泽东对经济建设的方针特别是经济建设的战略布局作了重新思考,作出新的部署,例如启动“三线”建设,涉及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内地工业与沿海工业的关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正确的观点、成熟的理论,离不开丰富、充分的实践。限于当时的条件,《论十大关系》主要是从一般意义上提出了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些原则,这些原则无疑是正确的,但由于实践经验还不够具体、丰满,只能随着实践的深化和发展,不断作出新的理论探索。正如毛泽东所说“有些事情还没有出现,虽然可以预料到,却不等于能够具体地提出解决的方针和办法”<sup>①</sup>，“只有原理原则,没有具体政策,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正确的策略只能从实践经验中产生,只能来源于调查研究”<sup>②</sup>，“许多问题是要经过较长的时间才看得出来的”<sup>③</sup>。经过“大跃进”的重大挫折,毛泽东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得出不少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性认识。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发表的谈话和批注中,提出了许多独创性思想;1960年6月写下《十年总结》,1962年1月在七千人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1965年在指导制定“三五”计划时提出了许多重要观点。他深刻认识到“有了总路线,还必须有一套完整的具体政策,不然不能把事情办好”<sup>④</sup>，“一整套的具体政策,不是凭空就能够得到的,非从经验中间总结不可。而要总结经验,就要有一个认识过程,要有几年时间”<sup>⑤</sup>。这些观点都应看作是《论十大关系》的补充。但由于种种原因,毛泽东生前却一直未再花精力对《论十大关系》作出修改充实。

关于经济建设,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两次坦率提到“经验不多”“经验不够”。讲到“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时,他说“中央、省市和工厂的权益究竟应当各有多大才适当,我们经验不多,还要研究。”<sup>⑥</sup>讲到“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时说“在解决中央和地方、地方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上,我们的经验还不够,还不成熟,希望你们好好研究讨论,并且每过一个时期就要总结经验,发扬成绩,克服缺点。”<sup>⑦</sup>他在《正处》中坦承,经济建设方面“我们还缺乏经验,因为才进行七年,还需要积累经验”。1956年11月,周恩来也曾经坦率地指出“这十大关系问题并不是一提出来就能解决得了的,具体的解决还需要今后在实践中、在采取具体措施中、在反对错误的倾向中不断努力。”“农、轻、重的比例究竟如何才恰当?现在还不可能回答得很圆满,必须经过多次反复探索,才能使这三者的比例安排得比较恰当。一个时候恰当了,过一个时候还要修改。”<sup>⑧</sup>1959年2月,毛泽东指出“对于经济建设我们还是小孩,应该承认这一点。向地球作战,向自然界开战,这个战略战术我们就是不懂,就是不会。”<sup>⑨</sup>究竟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毛泽东毕竟没有找到一条行之有效的具体道路,他坦言“搞社会主义我们没有一套,没有把握。”<sup>⑩</sup>直到20世纪70年代,他在会见外宾时仍直言不讳。在1970年的几次谈话中,毛泽东先后说道,“中国基本上还是个落后的国家。过去我们一些事做得不好,走了弯路。我们自己也不懂得怎么搞社会主义经济这一套。”<sup>⑪</sup>“我们也愁怎样把经济搞上去一点。”<sup>⑫</sup>“中国是一个不发达国家,工业、农业都不发达,现在正在想办法。”<sup>⑬</sup>

毛泽东在发表《论十大关系》讲话后,多次就其中的不少方面作过新的论述,不断提出一些新思想新观点,对社会主义建设形成了一些新认识。如提出了积累与消费、集中与分散、民主与集中、正确与错误、照抄外国与自力更生等几对矛盾,这些都属于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关系。他提出了“以工业为主导、以农业为基础”的国民经济发展方针;提出“两参一改三结合”的企业管理制度;对革命与生产的关系等作出了新的探索,认为技术加政治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办法等。《论十大关系》虽然有1965年整理稿和1975年整理稿,但就思想内容而言,都是依据并忠实于1956年的原初讲话,并未吸纳毛泽东后来在这

①⑨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04、584页。

②③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67、87页。

④⑤⑩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2、96~97、12页。

⑥⑦ 《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33页。

⑧ 《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31~232页。

⑪⑫⑬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96、312、622页。

些重大关系方面的新思考新观点,以及后来所作的新探索新成果。应当说,对《论十大关系》作出充实修改是毛泽东的夙愿。他在看过1965年整理稿之后,一方面表示同意刘少奇的建议,作为内部文件发给县、团级以上各级党委,同时又明确批示“此件看了,不大满意,发下去征求意见,以为将来修改之助。此意请写入中央批语中。”<sup>①</sup>1975年7月,胡乔木主持完成了一个《论十大关系》新的整理稿。邓小平认为整理得比较成功,致信毛泽东,“希望早日定稿,定稿后即予公开发表”。毛泽东审阅后批示“同意。可以印发政治局同志阅。暂时不要公开,可以印发全党讨论,不登报,将来出选集再公开。”<sup>②</sup>虽然毛泽东早有修订之意,但他却没有再倾注精力进行系统思考,增补新的内容,作出系统全面修订,只限在党内一定范围内有限传播,始终处于“未定稿”状态。所以,毛泽东两次不同意公开发表也就不难理解了。

毛泽东对于发表文章十分慎重。他总是强调理论要经过实践检验,他的讲话和著作也要在实践中得到验证才行,不成熟的、有待实践作出证明的东西不发表。这是毛泽东的一贯作风。1957年5月,他说过“我的一些讲话,当时并没有公开发表。1955年关于农业合作化的讲话,过了3个月才发表;今年2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指后来公开发表的《正处》——引者注),已经过了3个月,还在修改,也许下个月才能发表。这不是‘旧闻’吗?还有去年4月讲的‘十大关系’,已经一年多了,也还不准备发表,将来发表也是‘旧闻’。我这个人就是不想冒险,先讲一讲,看一看反应,再作修改,然后发表。有时修改多次还不满意,只好不发表。”<sup>③</sup>1958年3月,他明确说过“《论十大关系》究竟对不对?至少还要看五年。”<sup>④</sup>

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重大关系,毛泽东毕生处于探索之中,没有形成定论。例如,关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据有关资料介绍,有些内容没有整理进去,如“美国这个国家很发展,它只有一百多年就发展起来了,这个问题很值得注意”;“它的政治制度是可以研究的”;“我们也要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地方的权力过小,对社会主义建设是不利的”<sup>⑤</sup>。1966年3月,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央还是虚君共和好,只管大政方针、政策、计划。中央叫计划制造工厂,只管虚、不管实,也管点实,少管一点实。”“中央只生产精神。中央计划要同地方计划结合,中央不能管死,省也不能完全统死,计划也不要统死。”<sup>⑥</sup>1970年12月,毛泽东会见斯诺时进一步指出“就是要有两个积极性,中央的积极性和地方的积极性,让地方自己去搞,中央不要包办。统统抓在中央手里不行啊,管不了那么多啊!要学你们美国的办法,分到五十个州去。”<sup>⑦</sup>1975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引用了毛泽东的一段话“中央的部门可以分成两类。有一类,他们的领导可以一直管到企业,它们设在地方的管理机构和企业由地方进行监督;有一类,它们的任务是提出指导方针,制定工作规划,事情要靠地方办,要由地方去处理。”<sup>⑧</sup>再如,关于工业布局问题,也就是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的关系,以及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等,进入20世纪60年代,国际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我国面临着两个超级大国的巨大压力甚至战争威胁,于是不得不作出应对举措。1965年,毛泽东作出了加强三线建设的重大决策,对工业发展布局作出重大调整。这与当初《论十大关系》中的思想观点发生了很大变化。

综上所述,毛泽东生前之所以不同意公开发表《论十大关系》,主要原因在于他认为这篇文献还不够成熟,其中的若干重大关系问题需要实践提供更多的经验,从而作出更加系统深入的理论探索。

[责任编辑:穆敏]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90页。

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44页。

③ 吴冷西《忆毛主席》,北京: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36~37页。

④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25页。

⑤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05页。

⑥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69页。

⑦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59页。

⑧ 顾龙生《毛泽东经济理论与实践》,北京:红旗出版社,2010年版,第763页。